

季札及其在吴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张曾明

季札,吴王寿梦第四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90—510年左右,是吴文化开始形成时最早的名人,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从仅存的史料来看,季札是一个博学多才、开明通达而又交游甚广的人,它的言论和事迹,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主要有:

一、多次辞让王位。

公元前585年(吴寿梦元年),吴开始称王。寿梦有四个儿子,依次为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辞让不受。于是寿梦只好传位于长子诸樊,约定兄终弟及,最后传及季札。

公元前561年,寿梦死,诸樊立,诸樊愿立季札,季札辞,弃其室而耕。前548年,诸樊在攻楚中中箭,将死,又言于弟馀祭曰“必以国及札。”馀祭立,封季札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

前531年,馀祭死,馀昧立,四年欲授位季札,季札逃归延陵。

前527年,馀昧死,子僚立。

前515年,吴公子光(诸樊子)刺杀王僚,又请季札,季札去延陵,终身不入吴国。

从这段史实来看,季札多次礼让王位,从父亲一直到侄子的三代人手里,是真诚可信的。比之传说中的泰伯、仲雍让王奔吴要真实得多。比之同时代一心想做官的孔子要高尚得多。

二、交聘鲁、齐、郑、卫、晋等中原列国,议论通达。

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聘鲁、齐、卫、郑、晋等国,春秋左传称之为“吴通上国”。上国是中原人自尊自大的称呼,对吴、越等地一直视之为“蛮夷之邦”。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季札周游“上国”时却表现出很高的学识和修养。当时象齐的晏平仲、郑的子产、晋的叔向、鲁的叔孙豹等都是著名的改革家或大臣,他们都愿意倾听和接受季札的意见。

访鲁时,就和叔孙穆子讨论用人问题,季札指出“君子务在择人”,批评叔孙:“好善而不能择人,祸必及子。”访齐时,正值旧贵族姜氏统治已到了没落阶段,而新兴的陈氏收买人心的做法获得成功。季札看到了这种趋势,就劝晏平仲及早“纳邑还政”,以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遭殃;访郑时,和著名的改革家子产一见如故,季札对子产说,郑国当权贵族已经奢侈腐败,“必将有难”。并劝子产“慎之以礼”;访卫时,接触到卫国的一些名流,季札认为“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季札聘晋,见到了实权派韩宣子、魏献子、赵文子等人,季札对晋大夫叔向说:“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意思是说晋君奢侈而又懦弱,财富实力都在大夫家里,要防止因过于守旧而在将来的变革中遇难;访晋时,看到晋国社会的种种破败迹象,认为晋是一个“暴、力屈、乱”之国,随从问他为什么,季札的回答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暴”是说“吾入其境,田亩荒芜而不休,杂增崇高”。“力屈”是说“我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

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出。”“乱”是说“吾之其朝，君能视而不一问，臣善伐而不上谏。”这是对已经到了末路的晋国非常透彻的剖析，描述也很生动。

吴国出现象季札这样一位学识渊博，议论精明的人物，说明当时的吴国文化决不会落后于北方中原诸国。季札与同时代的孔子相比，也未必有逊。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复旧，认为只要恢复先王时代的“礼治”，天下的动乱就会自会止息，而季札却能够体察时代变革的脉搏，主张要顺应变革潮流。这是两人的最大区别。由于历代王朝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一直把孔子抬得高而又高。对季札虽然也敬重他的谦让风格，但并不重视季札思想中比较开明的东西，现在看来，最早的吴文化的开创性人物应当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季札，而不是孔子门生言偃。当然，言偃也有他的重要地位。

三、在交游中对各国乐歌舞蹈的评价，证明季札有较高的艺术思想修养。

根据史料记载，季札在周游列国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中原各国的音乐、诗歌和舞蹈。提到观看的乐歌有周南、召南之歌、邶、鄘、卫等歌，还有郑歌、齐歌、秦歌、魏歌、陈歌、唐歌、小雅、大雅和颂等。舞蹈则有象箭、南箫、大武、韶箭、大夏等。每听一歌、观一舞，都有一番评价。我们知道，古代是集诗、歌、乐、舞于一体的，歌舞都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它。但在当时能象季札那样绘声、绘色又会意的点评实在是少有的。孔子也未必有过这样系统的对歌舞的评价。由于这些歌舞早已失传，我们也很难对此作出判断。但可以看出季札的思想艺术修养是很高的。

四、在交游中季札的几则为人称道的操行风范对后世颇有影响。

一是季札在游历齐国返回时长子不幸身亡，葬在赢博之间。季札为此举行了一次葬礼，许多人都去观看，孔子也去了。令人深思的是这次葬礼很简单，一点也不铺张，不繁琐。“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尤其是季子在哭子中的几句喊话：“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亡也，无不之也。”这简短几句话，很好地表达出季札的生死观和感情。这样豁达的思想境界和简单的仪式，连一向主张繁琐仪式的周礼专家孔子也十分佩服地说“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二是大家都知道的季札挂剑的故事。季札路过徐国，徐君很喜欢季札的佩剑。待季札回来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特地去拜墓挂剑相赠，说“我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千金之剑矣挂丘墓。”成为千古传诵之佳事。同时也证明当时吴国的铸剑技术已驾乎中原各国之上。

三是季子游于齐，见遗金，呼牧者取之，却不料遭到牧者的拒绝。季子还要问牧者的姓名，牧者反而说：“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哉。”这件事给季子以很深的启示，证明普通的牧人，其道德操守要高于自己。孔子对这件事也感叹地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尽管有关延陵季子的事迹，记载得极为有限，但仍可以看出季札的精神风貌。而且前后一贯，没有矛盾，因而是可信的。当然，从今天眼光来看，季札的思想行为是有不少弱点的。但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进步的，是当之无愧的吴文化孕育的第一位杰出人物。

从季札的事迹中我们至少可以证明：

1、吴文化在春秋、战国之际无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都不亚于中原其他文化，并不是什么“蛮夷之邦”的落后区域。

2、吴文化在其发展中当然要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但它主要还是植根于本地区之中，并不

是从中原那儿移植过来的,更不是那一个人从中原带过来的。

3、延陵季子是当之无愧的吴文化开创期的第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风范对后人有很大影响,至今还可以从吴地文人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如好学、重信、谦让、开明等,今天仍可以择优继承。

(上接第 83 页)

“游击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领导人都是山大王”。并讲毛泽东“很少懂什么马列,像个绿林”。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及战争消耗这一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人员锐减,是由党的领导路线错误所造成的。因此对党中央的领导路线始终采取怀疑、观望态度。二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表现在对革命形势分析上,悲观失望,畏敌如虎,企图跑到偏闲地区去偷安,完全丧失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对战略方针制定上,缺乏全局观念,只顾眼前利益。如提出“打到天全、芦花吃大米”的近视口号,在人民军队建设上,视军队为个人工具,排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长征路上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团结还是分裂展开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挫败了其反党夺权的阴谋,避免了党和红军更大的分裂和损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党中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对张国焘给予耐心教育和诚恳的规劝,和风细雨,在某些方面还作了让步,最终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历史证实,分裂者是不得人心的,其结局只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注:

①⑤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1977.9.19。

② 余洪远《光荣的使命》,《艰苦的历程》(下)第 43 页。

③ 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44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1 第 1 版

④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1935.6.16)

⑥⑬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第 235 页,第 265 页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 1 月版

⑦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8.5)

⑧ 《中央为应专力北向不宜抽兵出击致张国焘电》(1935.8.15)

⑨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8.20)

⑩ 《张国焘借口不能北进致中央电》(1935.9.3)

⑪ 《张国焘命令部队回阿坝致倪志亮、周纯全等电》(1935.9.5)

⑫ 《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令张国焘迅速北上电》(1935.9.9)

⑬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20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4.7 第 1 版

⑭ 《彭德怀自述》第 204 页,人民出版社 1981.12 第 1 版

⑮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 2 辑第 18-19 页